

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1920-1927—— 一個組織史的考察

陳耀煌*

我們能否從一個更廣泛與比較性的視角切入，重新探討早期中國共產革命運動的特質呢？本文嘗試以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為基礎，就中共組織的分布，以及其成員，進行整體的分析。透過這樣的分析，筆者想要找出早期中共在北方地區組織建設與發展過程中展現出來的特質。而這樣的特質，與革命所處的環境，以及外來的政治、組織力量，又存在著什麼關係？這是本文的問題意識。

關鍵詞：中共、共產革命、組織史、華北地區、革命的生態學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我們能否從一個更廣泛與比較性的視角切入，重新探討早期中國共產革命在建立與發展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特質呢？

關於 1927 年第一次國共分裂以前中共的建立與發展，曾經是 1950-1960 年代西方中共革命史，甚至可以說是整個近代中國史研究圈中，備受關注的議題。著名者如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伊羅生(Harold R. Isaacs, 1910-1986)，以及懷廷(Allen S. Whiting, 1926-)、布蘭德(Conrad Brandt)與諾思(Robert C. North, 1914-2002)等人的經典著作，都是處理早期中共革命史的議題。¹當時所以有如此多的學者關注此一議題，主要是由於冷戰的背景，學者們急切地想要探究，究竟中共是蘇聯赤化世界陰謀的一部份、只是蘇聯的傀儡與否。而 1927 年以前的中共革命史，無論是中共的建立，還是後來國共合作的開展，都與蘇聯密切相關，也引起蘇聯領導階層內部的紛爭，理所當然也就成為學者關注的焦點。但是，也正是此一預設問題意識的局限，加上史料的不足，當時關於早期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蘇聯的對華政策、蘇聯與中共的關係，以及中共上層領導與路線的轉變上，甚少有關於地方基層革命的建立與發展的研究。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霍夫亨茲(Roy Hofheinz, Jr., 1935-)在 1969 年發表的一篇以中共成功的生態學為題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霍夫亨茲嘗試

¹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Harold R.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llen S. Whiting, *Soviet Policy in China, 1917-1924*; Conrad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924-1927*; Robert C. North, *M. N. Roy's Mission to China: The Communist-Kuomintang Split of 1927*.

從一個宏觀的角度切入，把國共合作時期的農民協會，以及後來所謂土地革命與抗戰時期中共革命根據地的分布地圖化，藉此分析 1923-1945 年間，中國共產革命所以成功的背景因素。雖然霍夫亨茲不像前幾位學者那樣關注蘇聯與中共的關係，但是，他的研究也明顯受到 1950-1960 年代西方中共革命史研究圈中極權主義典範的影響。他最後得出結論，即中共革命的成功，與農村裡的階級矛盾，或者日本入侵引起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甚至與革命所處的背景，皆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就像當時流行的極權主義典範般，霍夫亨茲認為，中共所以成功，毋寧是組織力量運作的結果。一旦中共取得一個立足點，它就會派出其工作人員，到周遭地區，訴諸操弄、威脅、利誘與拐騙等手段，發展成員，擴張自身勢力。²在後來發表的一本書中，霍夫亨茲就指出，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正是由於中共自身組織力量的薄弱，以及其所鼓吹的激進農村政策不適用於中國農村等原因，注定了當時農民運動必然敗亡的命運。³

1980 年代以後的學者，反對早期學者單單聚焦在蘇聯與中共的關係，以及中共上層的研究視角，也不贊成霍夫亨茲等學者突出中共組織力量的觀點。如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 1948-)等人後來在重提革命生態學時，就更強調中共革命與其所處客觀社會環境的結合。他們也承認中共領導與組織力量的主觀因素，但主張其作用僅限於把上層的指示因地制宜地適用於地方而已。⁴儘管反對，古德曼等人卻不能像霍夫

² Roy Hofheinz, Jr. "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 Rural Influence Patterns, 1923-1945," pp. 3-77.

³ Roy Hofheinz, Jr.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pp. 289-290.

⁴ Chongyi Feng and David S. G. Goodman, "Introduction: Explaining Revolution," pp. 12-13.

亨茲般，從一個宏觀的視角切入探討中共革命史，反倒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個別的地區。事實上，這也是 1980 年代以後西方中共革命史研究的趨勢，即革命史的地方化。在 1980 年以後出版的關於 1927 年以前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大多也是地方性的革命史研究。如馬克斯(Robert Marks, 1949-)與加爾比阿蒂(Fernando Galbiati, 1932-)關於海陸豐地區的研究，以及史密斯(Stephen A. Smith, 1952-)關於上海地區的研究。⁵方德萬(Hans J. van de Ven, 1958-), *From Friend to Comrade* 則是 1980 年代以後，西方學界少數嘗試從較宏觀的視角，探究 1927 年以前中共在各地的黨務建設與發展概況的研究。方德萬在該書中試圖證明中共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嚴密的列寧主義式政黨，而是依靠各式各樣私人關係結合而成的一個個地方性小團體。至遲要到 1927 年第一次國共分裂以後，中共才變成一個列寧主義式政黨。這樣的觀點非常有啟發性，而且作者也嘗試去探究與比較早期中共各地組織建設的異同。只是由於史料的不足，以及問題意識的限制，該書還是以中共上層政策與路線的轉變，以及中共中央內部的紛爭與組織政策為其焦點，涉及地方者還是有限。⁶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想要從一個較廣泛的視角，重新去切入探討 1927 年第一次國共分裂以前，中共在各地組織建設與發展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特質。由於主觀與客觀原因的限制，本文也不能以整個中國為分析對象，而是採取班國瑞(Gregor Benton, 1944-)所謂介於全中國和地

⁵ Robert Marks,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 1570-1930*; Fernando Galbiati,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 A. Smith, *A Road is Made: Communism in Shanghai, 1920-1927*.

⁶ Hans J.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方之間的中程視角，⁷即以 1920-1927 年間北方地區中共的組織活動為分析對象。由於篇幅限制，本文也無法詳述各個地區中共組織建設與發展的詳細經過，只能以 1980 年代以後，中共官方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為基礎，就中共組織的分布及其成員，作一個整體的分析。透過這樣的分析，筆者想要找出早期中共在北方地區組織建設與發展過程中展現出來的特質。而這樣的特質，與革命所處環境，以及外來的政治、組織力量，又存在什麼關係？這是本文的問題意識。

二、1920-1923 年間北方地區中共組織的建立與發展

首先，筆者要將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 1 卷中所記載的資料，予以圖表化。⁸《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是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檔案館等單位編著，記載 1921-1997 年間——有些地區追溯至 1920 年，全國的中國共產黨、政權組織、解放軍、政治協商會議與群眾團體的組織史資料，其權威性當不容置疑。本書最大的局限，在於其對於縣一級以下組織史的記錄稍顯簡略。事實上，自 1980 年代以來，中國各省與縣已分別出版了各該省、縣的組織史資料。這些省級與縣級的組織史資料，就有比較詳細記載縣以下的組織史情況。但是，由於篇幅所限，本文還是以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編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為主要分析對象。也就是說，本文是以縣級為分析的基礎單位。如有必要，才再參考其他各省、縣的組織

⁷ 班國瑞是以新四軍活動的華中地區作為其研究範圍，他嘗試逐漸而非急躁地，去找出某種適用於此一地區而不是全面的通則。Gregor Benton, “Conclus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orth and Central China in the Anti-Japanese Resistance,” p. 191.

⁸ 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 1 卷。

史資料，以補不足。

表 1 即是筆者根據《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記載的資料，作成 1927 年以前北方地區中共革命組織的分布表。表中所記載的縣市，即是有中共黨、團(1925 年以前的社會主義青年團，與以後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在其中建立者。如同方德萬所言，在 1924 年以前，中共黨、團之間並沒有清楚的分別；⁹且大部分黨員都是團員出身，所以表 1 的革命組織也包括團在內。除了表 1 外，筆者也作成了同時期南方地區中共革命組織的分布表。但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並沒有把此表在內文中呈現，而是將該表與表 1 的資料地圖化以後，呈現在圖 1 的 1920-1927 年中共革命組織分布圖。另外，筆者還針對《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所記載此一時期參與北方地區黨、團組織的幹部，作了一個調查，將各該幹部的出生年月日、籍貫、出身、參加北方地區革命時的年代與職業、1927 年以前的活動，以及之後的境遇，作了一個北方地區幹部列表。該表共收錄 1927 年以前參與北方地區中共黨、團組織 624 位幹部的相關資料。但是因為該表內容達上萬餘字，受限篇幅，無法完整呈現。如有必要，筆者只能在以下的敘述中，將相關幹部的情況以文字說明。以上的幾份圖與表，就是本文進行分析論述的主要根據。

從圖 1 與表 1 中，我們可以發現早期北方地區中共革命活動的幾個階段。第一，1920 到 1923 年間，中共在北方發展的地區，除了河北的安平是屬於較偏遠的農村地區，以及海軍基地山東煙臺外，其餘都是鐵路沿線的大城市。1924 年開始，北方地區的革命活動雖然還是沿著鐵路展開，但也開始在比較小的鐵路沿線城市與農村地區發展組織。到了 1925 年，北方地區的革命組織在河南突然有了大發展。在此之前，中共在河南只有於 1922-1923 年間在開封有組織活動，1924

⁹ Hans J.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p. 139.

年還一度停擺。然而，到了 1925 年，中共一口氣就在河南 11 個縣市建立了組織。到了 1926 年，中共在河南 18 個縣市建立了組織；山東有組織的縣市，也從 1925 年的 10 個增長 1 倍，成為 20 個。同時，中共的組織還開始向更偏遠的農村地區發展，如位於冀魯豫邊區的冠縣、陽谷、大名等縣。到了 1927 年，在陝西也出現了革命組織蓬勃發展的現象。根據《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的記載，中共在 1926 年以前，只在陝西的 4 個縣市建立了組織；到了 1927 年，中共一舉就在陝西的 24 個縣市建立了組織，足足增長了 6 倍。參酌當時外在的局勢，可以推測，影響此一時期北方地區中共組織發展的變化，有以下幾個關鍵的歷史事件：第一即 1923 年 2 月的二七事件；第二是 1924 年底、1925 年初中共與馮玉祥(1882-1948)合作的展開；第三乃 1926 年上半年北伐軍事的預備與開展。為了方便論述，以下我們即根據上述的變化，把 1927 年以前北方地區中共革命活動的發展，分成 1920-1923、1923-1925、1925-1926 與 1926-1927 年間四個階段。

在 1920-1923 年間，如前所述，北方地區中共的革命組織，主要是建立在鐵路沿線的大城市。反觀同時期南方地區的革命組織，則主要是沿著河道發展起來的，如上海與武漢的組織分別帶動同樣位於長江沿岸的安慶及成都、重慶組織的建立。又如湖南早期的組織，則是以長沙為核心，沿著洞庭湖支流散布出去。造成此一現象，除了自然背景的因素外，當然與早期中共在北方地區的革命活動以鐵路工人運動為中心不無關係。

眾所周知，中共北方黨最初是由在北京大學服務的李大釗(1889-1927)，以及團聚在其周圍的北大學子，如張國燾(1897-1979)、羅章龍(1896-1995)、鄧中夏(1894-1933)等人成立的。這些北大學子早在中共正式成立以前，就已開始接觸北京周圍地區(如京漢鐵路長辛店機廠)的工人。中共正式成立以後，成立了以張國燾為主任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勞組部)，積極投入北方地區的

工人運動。1922年4、5月間，直奉大戰爆發，直系擊敗了奉系軍閥，控制了中央政府。吳佩孚(1874-1939)為擴展自身勢力，遂與中共合作，由中共派員到各大鐵路擔任密察員，以抵制在北方鐵路系統中甚有勢力的親奉之交通系，中共也藉此機會沿著北方鐵路擴張自身勢力。直迄1923年2月，吳佩孚警覺中共勢力的坐大與工人運動的勃興對其不利，遂予以血腥鎮壓，造成著名的二七事件。中共與吳佩孚的合作因此中止，其在北方鐵路沿線地區的活動，也暫告一段落。

上述的幾個原因，部分說明了為何早期北方地區的中共組織是沿著鐵路展開的。如京奉鐵路製造廠所在地唐山的組織，即是由北京黨成員兼勞組部北方分部書記羅章龍建立的，該地第一個工人出身的黨員鄧培(1884-1927)也是由羅介紹入黨。又如開封第一個黨組織，也是由北京黨兼勞組部成員張昆弟(1894-1932)在開封車頭廠吸收京漢路工人凌必應(1893-1988)成立的，凌後來也參加了二七罷工。徐州的第一個組織也是由羅章龍等人發展起來的。據羅所言，徐州與開封隴海鐵路的工人同屬老君會的勢力。後來羅即是在老君會的幫助下，鼓動工人起來罷工，即1921年隴海鐵路罷工事件。1922年，即開封建立組織的同一年，徐州也建立了中共第一個組織—隴海路徐州站支部，由隴海路徐州站工人姚佐唐(1898-1928)擔任書記。¹⁰反觀早期中共在南方建立組織的地區，除了萍鄉的安源，以及津浦鐵路終點站南京等少數的例外，很少是單純為了發展工人運動而成立者。這就更突顯了早期北方地區中共組織的發展與工人運動的關聯性。

當然，並非早期北方地區中共組織的分布，全都與勞組部和鐵路工人運動有關。以天津為例。天津組織的建立者是北洋大學學生張太雷(1898-1927)，張是居住在天津的俄共代表鮑立維(С. А. Полево́й)的翻

¹⁰ 羅章龍，《椿園載記》，頁147-174。

譯。當時李大釗常與鮑立維往來，張因此與李建立了密切的關係。1920年10月，張太雷即在天津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由此可見，天津建立革命組織的契機，是李大釗與張太雷的來往，而不是工人運動。再一個例子則是太原。太原位於正太鐵路的終點，但是中共組織在該地的成立也與工人運動無關，而應歸功於一位晉籍的北京黨成員高君宇(1896-1925)。高是山西靜樂縣人，1916年從山西省立一中考入北京大學，1920年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此以前，高即多次回太原與其省立一中的後進王振翼(1901-1931)等人聯絡。1921年，在擔任北京社青團書記後，高在組織的派遣下，回太原吸收了王振翼、賀昌(1906-1935)等人入團，成立團的組織。¹¹所以，太原組織的建立，也與工人運動無關。但是，儘管如此，這些城市的組織也同樣受到早期北方地區共產革命偏重工人運動性格的影響。如王振翼、賀昌，還有另一位同樣在太原求學時加入中共的傅懋功(即彭真，1902-1997)，他們後來皆參與並成為鐵路工人運動的領袖。所以，工人運動確實是影響早期北方地區中共組織建立與發展的一個主導因素。

事實上，除了工人運動外，組織成員的外來性格，也是影響早期北方地區中共組織的分布，以及其與南方地區的組織發展呈現不同趨勢的一個關鍵因素。就以北京黨為例。據《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的記載，1921年8月至1922年7月中共北京黨的9位幹部中，只有李大釗、安體誠(1896-1927)兩人分別是河北的樂亭與豐潤人，其他7人中，有4位湖南人，2位湖北人，1位山西人。而且，不僅這兩、三年內是如此而已，從1920年至1927年國共分裂為止，曾擔任北京地區各級中共黨、團組織幹部的78人中，除去資料不詳者14人外，河北與北京當地出身者有9人，河南籍1人，山西籍3人，山東籍3人，

¹¹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中國共產黨山西歷史(1924-1949)》，頁50-52。

陝西籍 3 人、江蘇與上海籍 3 人，浙江籍 2 人，安徽籍 1 人，江西籍 2 人，湖南籍 19 人，湖北籍 7 人，四川籍 6 人，廣西籍 3 人，雲南、福建各 1 人。明顯的還是以外來者居多，而且南方人佔了一半有餘。如果對照南方地區中共革命組織的發源地與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僅就 1921-1924 年間上海地方委員會與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的 22 名幹部來看，除去 2 位出身不詳者外，其餘 20 名中，浙江籍 11 位，江蘇籍 2 位，湖南籍 3 位，江西籍 2 位，山西籍 2 位，光是與上海相鄰的浙江、江蘇籍就占了超過一半強，與外來者居多的北京組織完全相反。

不同的出身有什麼影響呢？讓我們再從上海的情形說起。上海黨、團組織內部的許多浙江籍成員，因為鄰近家鄉的緣故，很容易就把組織傳回他們的家鄉，如杭州、紹興、寧波、嘉興等地的黨、團組織，就是由上海組織的成員俞秀松(1899-1939)、徐梅坤(1893-1997)、莊文恭(1901-1965)、顧作之(1900-1977)等人建立起來的。而且他們還透過自身及其所吸收成員的關係，把中共的組織帶入底層農村。中共官方黨史號稱由中共領導的第一個農民協會，蕭山衙前農民協會，就是由 1920 年與陳獨秀(1879-1942)一同發起成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沈定一(1883-1928)建立的。沈定一雖然 1921 年後就離開上海回到家鄉，後來還與共產黨漸行漸遠，但他和中共上海以及杭州等地組織的關係還是很密切，如上海黨的徐梅坤、徐白民(1895-1963)，以及杭州團的唐公憲(1898-1938)等人，都是沈的好朋友。他們還曾應沈的邀請，到衙前小學任教。¹²

除了上海以外，中共在南方其餘各省首批建立的組織——通常是位

¹² R. Keith Schoppa, *Blood Road: 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 pp. 97-101.

於各該省的省會，許多也是由在地的知識份子建立。這些知識份子在放假或畢業回鄉之際，有意無意地把組織關係帶回其家鄉，因此南方地區的組織很早就開始向農村擴展。如安徽壽縣就是一個例子。壽縣雖然不是一個大城，卻是最早有中共組織關係的安徽農村地區。原來在五四運動時期就有幾位來自壽縣的知識份子在蕪湖求學，其中如曹蘊真(1901-1927)等人在畢業後赴上海求學，並在上海加入中共。曹等人乘放假與畢業回鄉之際，把組織關係帶回去。其中有的返鄉知識份子還擔任農村小學教員，利用其職位與關係，吸收成員，建立組織。¹³在湖南也是如此，如常德即是由在上海結識施存統(1898-1970)、並加入社青團的常德湖南省立二師學生丁勒生(丁默邨，1901-1947)將組織帶回去的；¹⁴耒陽組織也是由回鄉的衡陽湖南省立三師學生劉泰(1903-1928)成立的，¹⁵衡陽本身的組織則是由來自長沙的毛澤東(1893-1976)親自建立起來的。南方地區的中共組織，許多就是透過在城市求學的知識份子黨、團員，或乘地緣之便，或乘放假及畢業回鄉就職之際將組織向外擴散出去的。

回到北方地區。如前所述，北京組織的成員以外來者居多。這些外來者沒有地緣之便可資運用，所以較不利於革命組織的向下扎根。但是，外來者的身分也有其優勢。首先，作為一位外來者，因為不容易打入地方農村社會，所以他們往往更熱中於城市的工人運動，這對於標榜無產階級革命的早期中共來說，無疑是一項有利因素；再者，外來革命者較不易受到地域等特殊關係的束縛，並且能夠利用鐵路網絡與上層的政治關係，使革命組織超越地域的界線，橫向地向外展

13 趙志華，〈安徽最早的黨組織——壽縣小甸集特別支部的建立和發展〉，頁 8-10。

14 常德市志編纂委員會編，《常德市志》，頁 774。

15 耒陽市志編委會編，《耒陽市志》，頁 853。

開。如前所述，早期北京黨就是透過鐵路與吳佩孚的掩護向北方其他城市擴散開來的，甚至遠至南方的南京也可以發現他們的蹤跡，如後來成為中共工運領導者的王荷波(1882-1927)，即是在南京津浦路浦鎮機廠作工時，被羅章龍吸收入黨。¹⁶可是，羅章龍等人雖然能夠利用鐵路橫向地跨越省際擴展其活動，卻不擅於向下扎根。所以，他們活動過的地區，即使建立起中共的組織，卻皆缺乏地方群眾基礎，以致工人運動的浪潮一過，這些組織就容易瓦解。如河南開封在二七事件後就停止組織活動，即使 1925 年重建，也是由中共中央直接派人建立，與二七事件前的基礎無甚關係。

早期中共北方地區革命者在鐵路沿線各大城市建立的組織缺乏基礎的又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在這些城市所吸收的工人成員，絕大多數也像他們一樣是外來者。如前述唐山的鄧培是廣東人、開封的凌必應與徐州的姚佐唐是安徽人、南京的王荷波則是山西人。這些外來工人與當地社會有隔閡。例如在唐山，雖然中共透過鄧培的關係，順利地打入唐山的京奉路機廠，但是他們卻沒辦法進一步擴展至開灤煤礦，因為開灤煤礦的礦工多是來自周圍農村地區的北方小工，他們和唐山機廠的廣東人互不往來。當時唐山團也感慨地說，外來者的身分，「在這地域觀念尚重的環境中，對外工作，多所不便」。¹⁷

這些建立在鐵路沿線城市的組織所以不穩固的再一個原因，即這些外來的工人運動者，既不能與工人套同鄉交情，只能訴之以意識形態，有的甚至依賴政治力量予以拉攏。原來當時與中共合作者，大多

¹⁶ 黃啟權，〈王荷波〉，頁 44。

¹⁷ 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 1，〈唐山團內外組織情況報告〉，1926 年 1 月 21 日，頁 467；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 2，〈順直省委對唐山工作計劃之指示〉，1928 年 3 月，頁 280-281。

是各路工人的領袖，如羅章龍即是在老君會領袖魏榮珊同意下才得以發動隴海鐵路工人罷工。這些工人領袖本就與各派政治勢力有勾結，藉此從事販賣鴉片、勒索運商等非法情事，各派政治勢力也拉攏他們為己用。¹⁸一般工人亦是如此，他們「依靠政治的心理，非常之深」，「總以為政治勢力是非常可怕，必視一軍事勢力作靠山」。¹⁹所以中共才可以透過與吳佩孚的聯合，順利地打入工人當中。然而，太依賴政治力量推動工人運動，其後果可能就如二七事件般，一旦結盟的政治勢力背離革命，工人運動就會立即崩潰瓦解。再者，透過政治力量去結合的工人領袖，很多也是投機者。像是曾參與二七事件的工人領袖，如鄭州工人劉文松(1887-1943)、羅海臣等，在國共分裂以後，都成為中共恨之入骨的「工賊」。這些弱點，也是中共透過外來者發動工人運動時不得不冒的風險。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早期北方地區共產革命發展的幾個重要特性，即對鐵路工人運動的偏重，對上層政治勢力的依賴，以及外來者的性格。當然，不是說這幾個特質，就可以概括說明此一時期北方地區中共組織發展的情形。前述外來與在地出身革命者的性格與行為模式的差別，也只是一種理想類型，在實際的運作上，兩者間的分別並不總是如此的截然明顯。如外來者也會透過同鄉等特殊關係去從事組織活動。像前述北京組織的成員中，以南方地區出身者居多，而且這當中又以湖南人占多數。此一現象，難道只是巧合，而不會是湖南籍的北京組織成員有意無意地透過他們同鄉的關係去吸收成員嗎？又，與中共合作的工人領袖及其團體，不也是表現出

18 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2，〈河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27年11月24日，頁326。

19 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2，〈河南工運報告〉，1927年10月03日，頁130。

很強的地域性嗎？如徐州的老君會就是一個湖北幫。又如鄧培服務的唐山製造廠裡的工人，也是以廣東人居多。當時鄧培就透過其關係，吸收了梁鵬萬(1898-1951)、阮章(1902-1926)等廣東籍工人加入唐山的組織。

再者，雖然外來的革命者留在北方地區工作的時間不長，如勞組部的羅章龍、鄧中夏等人，他們在二七事件後就離開北方地區。但其中也有少數的例外，如同樣是北方勞組部的重要領導幹部之一，湘籍的張昆弟在二七事件後，直到 1931 年為止，大部分時間都還是留在北方工作。而且他的活動也不限於鐵路工人運動，在 1926 年被調任中共山東地委書記後，他也投入在地農村組織的建設工作。

整體說來，不能否認的是，此一階段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確實展現出較強的外來性格，以及對鐵路工人運動的偏重，與對上層政治勢力的依賴。這些特質既突顯了早期北方與南方地區共產革命的差別，也影響了日後北方地區共產革命的發展。

三、1923-1925 年間北方地區中共組織的建立與發展

在這一階段，我們要把焦點轉向山東。正如圖 1 所示，在 1923 年後，山東地區的組織迅速發展了起來；到了 1924 年，山東還成為北方地區最多組織的省份。為何出現此一現象是本節首要探究的。

如表 1 所示，山東最早建立組織的城市，是濟南、青島、淄博(淄川與博山的合稱)與煙臺。其中作為省會的濟南，理所當然是山東組織的發源地，也是後來山東黨領導的所在地。青島、淄博則是作為工業重鎮而被當成組織發展的重點城市；至於煙臺組織的建立者是福建閩侯籍的煙臺海軍軍官學校學員郭壽生(1901-1967)，他是由前述工人運動領袖鄧中夏、王荷波吸收的。根據筆者所蒐羅早期山東地區組織成員的

個人資料所示，除了煙臺的組織全部是外籍成員外，山東其他地區的組織或以在地山東籍的成員居多。以濟南為例，根據《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的記載，1922-1924年間，濟南各級黨、團幹部共20人中，除去身分不詳者4人外，有山東籍13人，山西籍1人，浙江籍1人，江蘇籍1人。在1927年國共分裂以前，整個濟南黨、團的幹部65人中，除去身分不詳者22人，山東在地籍的成員也佔了二分之一強，有33位。在青島，筆者蒐集到1923-1927年間青島黨、團幹部共34人，目前可以確定身分的22人中，有19位即是山東在地出身者。1923-1927年淄博黨、團幹部19人中，除去身分不詳的8人外，其餘11人也全是山東籍。

顯而易見的，早期山東的組織比北京組織表現出更強的在地性。但是，與北京組織相同，中共最初並沒有利用此一在地性的優勢，將山東的組織向底層，乃至於農村扎根。原來，早在1921年中共成立之際，中共一大代表中便有來自山東的王盡美(1898-1925)與鄧恩銘(1901-1931)。但是，山東成立正式組織，則要等到1922年8月中共二大以後，中央代表陳為人(1899-1937)來到濟南，成立以王盡美為書記的中共濟南地方支部。在此之前，勞組部山東分部業已於5月底成立於濟南，主任亦由王盡美擔任。事實上，從王盡美的行動來看，他更多是代表勞組部活動，而不是山東黨。原來，早在6月間，他即先後在濟南的津浦路大槐樹機廠與淄博煤礦從事工人運動。在中共二大期間，王遇到了羅章龍，並要求後者調他到北京的勞組部北方分部工作。因此，事實上在濟南支部成立後，王盡美早就不在濟南，而是遠赴山海關等地從事工人運動。²⁰王盡美當時的理想，和羅章龍等北方勞組部的領導相同，即著眼於更廣闊的整個北方地區，乃至於全國性的工人運動，而不是致力於革命組織的

20 丁龍嘉、張業賞，《王盡美》，頁53-102。

向下扎根。

二七事件打碎了勞組部試圖建立一個全國性工人運動的美夢，王盡美也早在 1922 年底，因為山海關當局的通緝，回到了山東。儘管如此，王盡美與山東組織依舊把他們的重心放在工人運動上，而且還是以鐵路工人為中心，特別是膠濟鐵路的青島四方機廠，以及津浦路的濟南大槐樹機廠。²¹不過，當時北方地區的鐵路工人運動，已是強弩之末。如接替離去的羅章龍等人擔任北京黨領導的何孟雄(1898-1931)等人，雖然繼續在張家口的平綏鐵路工人間活動，但是當時北京黨在失去吳佩孚的政治奧援後，只能依靠過去殘留的舊線索從事活動，很難有新的開創。²²

與北京不同，山東組織的在地性，在此一階段即開始發揮它的優勢。根據筆者對早期山東組織成員的分析，可以發現山東組織的成員雖然也以知識份子佔多數，可是與北京及其他地區不同者，山東的組織較具多樣性。如 1923 年 8 月成立的中共濟南地方支部的 9 名成員中，即有 3 位是工人出身者(王用章(1897-1957)、王復元(1900-1929)、賈

²¹ 1923 年被派到青島指導建團工作的王振翼就指出，「吾人今先應注意交通工人」，因為「交通工人較別種工人易於組織」，且交通工人具有「新式工業進取戰鬥的思想」。至於其他的工人只是交通工業的副產品，所以交通工人還具有領導他種工人的智識與環境。濟南市檔案館等編，《濟南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輯 1，〈王振翼關於青島濟南等地工運、學運情況致劉仁靜信〉，1923 年 11 月 15 日，頁 42-43。這段話同時也解釋了為何羅章龍等勞組部領導會特別重視鐵路工人運動。

²² 何孟雄是湖南炎陵人，1920 年他在北大擔任旁聽生時，就已參加北京馬克思主義小組。1921 年秋，北方勞組部成立，何也是其中的一員。雖然何也曾參與長辛店等地工運，但他主要的活動對象是張家口京綏鐵路工人。二七事件後，何指導張家口的組織隱蔽鬥爭，秘密聯絡，使得張家口遭到的損失較小，也因此該地組織在事件後得以繼續發展。曹仲彬，〈何孟雄〉，頁 198-217。

乃甫(1900-1964))，還有一位濟南道生銀行的職員張葆茵(張筱田)。另一份1923年濟南團登記表所列舉的27人中，工人出身與現任工人者即有10位。²³而且，我們還發現，與羅章龍等人在唐山、開封、徐州等地發掘的工人成員不同，山東的工人成員都是在地出身者。而且，這些人不僅是工人，他們有的還有知識份子的背景，其中如王用章，還曾被招募為華工赴歐洲，後經蘇聯回國，具有國際的視野。²⁴

我們不清楚為何山東組織中的工人成員以在地籍居多，還有知識份子背景。這裡要說的是，正是透過這些在地籍工人成員的關係，山東地區的中共組織，才可能在二七事件後有突破性的發展。例如，在青島的四方機廠，原來在二七事件後，前述勞組部幹部王荷波曾到四方機廠，與該廠的一個傳統工人組織「聖誕會」的會長山東章丘人郭恆祥(1894-1929)聯絡。只是王後來沒有把組織關係留下來。當鄧恩銘隨後從濟南來到青島後，想與郭恆祥接頭，但沒有關係，「不得其門而入，誠屬憾事！」²⁵後來才在王復元的介紹下，鄧與郭接上了頭。事實上，若不是在地籍成員的幫助，遠自貴州而來的鄧恩銘，在青島幾乎施展不開。²⁶而這個時候，王用章、王復元也利用他們的關係，在淄博、張店等地從事工人運動，成為各該地中共組織的創建者。

²³ 濟南市檔案館等編，《濟南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輯1，〈濟南地區團員登記表(1923)〉，頁59-60。

²⁴ 王用章與王復元是兄弟，山東歷城人，他們也是山東黨的創建者之一。只是1928年兩位兄弟叛變，從而導致中共山東黨的大破壞，其中如鄧恩銘即是因為他們的叛變，被捕遇害。因此，現在我們對王氏兄弟所知不多。只知王用章曾赴法作華工，王復元念過書，曾在濟南省立一中擔任電工兼傳達員，與知識份子往來，還參與創辦《山東勞動周刊》。兩兄弟皆是早期山東工運的領導者。

²⁵ 濟南市檔案館等編，《濟南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輯1，〈鄧恩銘關於青島工作情況致鄧中夏信〉，1923年9月20日，頁36。

²⁶ 張業賞、丁龍嘉，《鄧恩銘》，頁74-76。

這些在地籍的革命者，不僅可以幫助中共打入青島、淄博等地的工人群眾當中，也有助於中共組織向山東農村扎根。如濟南黨的王翔千(1888-1956)在 1922 年秋赴青州(益都)省立十中教書。透過此職位，王翔千吸收了許多來自周圍農村地區的知識份子加入中共。後來青州黨、團的成員，例如王懋堅(1898-1930)、王元盛(1906-?)、杜華梓(1900-1951)等人，都是十中畢業的學生。²⁷還有一位青州十中的學生劉子久(劉俊才，1901-1988)，他後來把組織帶回其家鄉廣饒，吸收了他的堂哥廣饒農民劉良才(1890-1933)等人入黨。另一位廣饒人延伯真(1897-1968)，他於 1922 年即曾嘗試在其家鄉興辦小學，實現鄉村教育的計畫，結果以失敗告終。後來他到了青島，被鄧恩銘吸收入黨。1924 年後，他再回廣饒，吸收了同村人延安吉(1902-1986)，以及他過去在濟南省立一師求學時的同學壽光人張玉山(1898-1927)等人入黨，成立了中共壽廣支部。²⁸事實上，在同一年，北京組織也開始向周圍河北的農村地區發展。如李大釗的家鄉樂亭到了 1924 年也建立起組織，但不是由李回鄉所建，而是通過另一位名叫王岑伯(1886-1973)的樂亭籍北大學生回鄉擔任樂亭中學校長以後，才開始建立組織的。²⁹另外還有一位北京法政大學畢業的弓仲韜(1886-1964)，在 1923 年回到他的家鄉安平，創辦了平民夜校，成立安平第一個中共支部。³⁰

所以，1923 年以後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與前一階段比較下，展現出較強的在地性。但是，雖然在地性增加了，與南方地區比較下，北方地區成員回鄉活動發展的比例還是比較低。以山西為例，如前所述，山西組織是由高君宇在 1921 年回太原吸收賀昌與王振翼等人後

27 青州市志編纂委員會編，《青州市志》，頁 1049-1051。

28 山東省廣饒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饒縣志》，頁 923、961-962。

29 姜德輝，〈唐山農村黨組織的建立〉，頁 170。

30 商海，〈安平縣黨組織創始人弓仲韜〉，頁 5。

所建立的。但是，賀、王等人在山西省立一中畢業後，也都離開了山西，沒有回鄉活動。《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記載的 38 位 1927 年以前山西太原中共各級黨、團幹部，目前可以確定是山西籍且能找到相關資料的 16 人中，恐怕只有 2 位曾回鄉活動，其他或在 1924 年考入黃埔軍校，或在 1925 年赴蘇聯留學，還有像王振翼等人被調到外地工作，從此離開了山西。如果我們把太原與湖南長沙的情形作比較，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記載的同一時期長沙各級黨、團幹部 54 人中，確定是湖南籍且能找到相關歷史記錄的 35 人，就有 28 人在 1927 年以前大部分的時間留在湖南工作。光是這一簡單的統計，大概就可以說明為什麼 1927 年以前中共的組織會在湖南遍地開花，但在山西卻只是寥若晨星，如圖 1 所示。

在山東也是如此。首先，山東地區知識份子成員回鄉任教與發展組織的活動，更像是由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發起的。原來，早期山東地區中共組織的建立與發展，一開始就與國民黨息息相關。1920 年 8 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陳獨秀即函約王樂平(1884-1930)在濟南建立共黨組織。王樂平是山東諸城人，1907 年即加入同盟會，他非常熟悉另一位國民黨山東籍大老丁維汾(1874-1954)及中共的創建者陳獨秀與李大釗。事實上，早期中共山東黨的成員，與丁維汾、王樂平等人也都是非親即故。如王盡美與王翔千即是王樂平的同鄉山東諸城人，其中王盡美與王樂平還是遠親。³¹所以，中共在山東地區的活動，很多都是透過國民黨已經建立的網絡展開的，如前述知識份子回鄉任教與發展黨務組織的活動即是一例。據丁維汾所言，原來早在 1922 年之際，丁維汾即已奉孫中山之命，回山東成立平民學會，透過辦學吸收青年學生入黨。當時平民學會在濟南設有總會，另在青州、煙臺、

31 〈王哲同志談王樂平情況〉，頁 66。

曹州、青島、武定等地設有分會。巧合的是，青州分會即是設在前述王翔千任教的省立十中及第四師範，而且負責人即前述的劉子久與另一位中共黨員李耘生(李殿龍，1905-1932)。中共方面的文件亦證明，「平民學會，國民黨設立的」，發起者為國民黨人。前述廣饒籍的中共黨員延伯真曾想在家鄉建立小學，應該就是平民學會工作的一部分。³²正因為國民黨在山東的歷史比共產黨久，老一輩國民黨員的網絡也比年輕的中共革命者廣，加上山東國民黨比共產黨更早注意到透過平民學會、設立學校，吸引大城市以外的農村青年加入革命行列，所以當 1924 年中共在山東的 8 個縣市(見表 1)已建立其組織之際，國民黨已在山東的 15 個縣市(濟南、益都、廣饒、惠民、陵縣、煙臺、威海、濰縣、諸城、荷澤、蒲台、濟寧、棲霞、德縣、邱縣)建立了黨部，其中如惠民、諸城、荷澤、蒲台、濟寧、棲霞、邱縣還是遠離鐵路的縣市。³³

事實上，在其他地區，我們也可以發現，老一輩國民黨的革命者比年輕的共產黨員更早注意到向農村扎根的重要性。如前述浙江的沈定一，雖然他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發起人之一，但他後來和國民黨走得比較近，並且因為附和戴季陶主義，而被共產黨開除黨籍。沈定一和王樂平、丁維汾等人分別是 1883、1884 與 1874 年生，當共產革命開始發動時，他們已經是四十歲左右的人了。他們都很注意革命組織的向下扎根，不只是在大城市，也包括偏遠的農村地區。而且他們的手法也都相當類似，即透過成立學校，吸收青年平民，如沈定一設

32 鄧恩銘在給團中央的報告中論及平民學會時說道，「遇著小學風潮，白真(延伯真)同志更無暇顧及了，這亦是失敗之一原因」。這可能就是指延伯真過去成立小學失敗之事。濟南市檔案館等編，《濟南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輯 1，〈團濟南地委工作報告(1923)〉、〈鄧恩銘關於青島政情及群運情況致團中央信〉，1924 年 7 月 15 日，頁 58、85。

33 丁維汾，《山東革命黨史稿後編》(上)，頁 2-6。

立的衙前農民小學，以及丁維汾的平民學會等。在北方地區的另一個例子就是保定育德中學。育德中學是由同盟會河北分會主盟人陳幼雲(1879-1909)，以及另一位北方同盟會領袖郝仲青(1879-1957)在 1908 年設立的，其目的就是為了培養革命後進與建立秘密活動據點，連中共也稱讚該校「創辦人全係同盟會之老黨員，頗有革命精神，故其教育重實用，非他校當差式的可比」。後來中共領袖劉少奇(1898-1969)、李維漢(1896-1984)、李富春(1900-1975)等人皆曾在該校附設的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學習。³⁴1920 年，另兩位北方國民黨員江浩(1880-1931)、李錫九(1872-1952)接辦了育德中學。江浩是河北玉田人，生於 1880 年；李錫九生於 1872 年，是安平人。前述中共黨員弓仲韜在 1923 年回安平辦平民夜校時，李錫九也於同年回鄉辦平民夜校，兩者是否有聯繫，頗引人遐想。³⁵無論如何，育德中學吸引了不少來自周圍農村地區的年輕人，他們在 1922 年時就在北京黨鄧中夏等人的影響下，在保定結成社會主義青年團。所以，保定團是早期河北地區少數有大批在地知識份子參加的組織。³⁶

當然，這些老一輩的國民黨員在從事平民教育時，也不是有意識地向農村扎根。如丁維汾就明言，他們成立平民學校，是要吸收青年與工人，並沒有提到農民。³⁷而且他們所吸收的在地知識份子，很

34 市地名辦公室，〈育德中學的革命活動〉，頁 101-103；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 1，〈團保定地委關於社會情況及組織工作的報告(1924)〉，頁 204。

35 商海，〈李錫九的革命生涯〉，頁 2。

36 據保定團的報告，在 1922 年 4 月，該團即有 25 人參加，除了一位來自福建者外，其餘全是河北與京兆地區的在地人。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 1，〈王錫疆關於保定團稱社會問題研究會的原因致國昌的信〉，1922 年 4 月 6 日，頁 16-18。

37 丁維汾，《山東革命黨史稿後編》(上)，頁 2。

多一開始也沒有把革命向農村扎根視為其職志；相反的，其中許多人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更傾向於城市的無產階級革命。例如，在東北的大連，也有一個由資深國民黨員傅立魚(1882-1945)成立的中華青年會，其目的也是辦理以青年與工人為對象的平民教育，在大連地區影響頗大。如表 1 所示，從 1924 年開始，中共即在大連建立了組織，而且其中的主要成員如董秀峰(1898-1943)、楊志雲(1899-1975)、唐宏經(1901-2005)等人，都是青年會的幹部或成員。可是楊志雲等人並非真心支持傅立魚的事業，他們只是拿青年會「做種招牌」，打入其辦理的平民教育，並且「計劃暗中用《工人周刊》及《勞動青年》為課本」。³⁸事實證明，當時中共在大連的主要陣地是由滿鐵沙河口工廠工人組成的中華工學會，其領導者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傅景陽(1900-1942)。傅立魚生於 1882 年，楊志雲等共產黨成員全部生於 1900 年前後。從這裡即可發現，國民黨雖然辦理平民教育吸收青年和工人，其中也包括共產主義者，但他們並不贊同激進的共產革命；年輕的中共成員雖然加入國民黨或其主辦的平民教育，但瞧不起老一輩國民黨員的作法，更沒有忘懷城市無產階級革命的理想。³⁹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執著，也部分說明了為何此一時期在地籍年輕的共產革命者甚少回鄉活動。

在山東亦是如此。雖然老一輩的國民黨員較注意透過平民學校，吸收來自偏遠農村地區的青年人。可是這些年輕人，特別是共產主義者，深受共產主義潮流的影響，仍舊一心嚮往城市地區的工人運動，

38 中央檔案館等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 1，〈團大連特支關於十月份工作情況給團中央的報告〉，1925 年 11 月 18 日，頁 90。

39 傅景陽即批評傅立魚「非常有錢，帶親日臭味，並且非常反對我們主義」。中央檔案館等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 1，〈傅景陽給團中央局的信〉，1925 年 9 月 23 日，頁 75。

而不是農村裡的平民教育或農民動員。如前述的青州組織，雖然也吸收了來自周圍農村地區的知識份子，但他們的主要活動是與當地火柴公司的工人來往，而不是回鄉教育或動員農民。⁴⁰事實上，這些年輕學子更傾向留在城市，而不是回鄉生活。蓋農村的生活水平不如城市，即使他們可以回鄉擔任小學教師，但農村小學教師的薪資也非常低。⁴¹可以的話，青年學子希望留在城市求學或者工作。⁴²這也是為何當 1925 年 10 月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立以後，許多來自各地年輕的革命者會踴躍報考的一個原因。濟南的組織在 1925-1926 年間即派出了王辯(王翔千之女，1906-1987)、侯玉蘭(侯志，1905-1982)、王平一(1905-)、秦縵雲(1908-2001)、裘東莞(謝億仁，1908-1992)、王蘭英(1908-1933)等人赴蘇聯學習，其中以女性居多，這也是頗值得玩味的現象。再如前述山西太原的組織，也有 3 位於 1925 年赴俄留學。

又如前述保定組織雖然也吸收了許多來自周圍農村地區的知識

40 濟南市檔案館等編，《濟南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輯 1，〈團青州支部關於組織活動情況的報告〉，1924 年 11 月 30 日，頁 116。

41 根據河北玉田籍黨員張明遠的回憶，他在玉田農村擔任小學教員的工資每月只有 5-6 元，好的也只有 7-8 元，還不包括伙食。張明遠，《我的回憶》，頁 16。根據李景漢 1930 年代在河北定縣的調查，該地農村小學教員工資最低者全年才不過 40 元而已，即每月不到 4 元。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頁 216。

42 如另一位青州籍的女性成員趙魯玉(1901-1937)。趙生於 1901 年，她的兄長趙峙(1889-1968)是同盟會員，與丁維汾、王樂平的關係密切。趙魯玉本人在青州念完中學後，就在王樂平的推荐下，赴日本留學。回國後先在濟南擔任護士，後又在青島膠澳商埠電話局當司機生。電話局司機生是一份高薪的工資。1927 年，北京市電話工人每月的工資，最低 10 元，最高可達 40 元。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典藏檔案(以下簡稱黨史館)，部 10999，〈北京特別市黨部工人部五月份報告〉，1927 年 7 月 4 日。趙與另一位在青島當護士的青州同鄉丁祝華(1900-2002)，是 1923 年鄧恩銘在青島建團時最初吸收的成員。

份子，但這些知識份子在畢業後回鄉活動者也不多。有的如 1922 年保定團的創建者高陽人王錫疆(1905-1925)，隔年就到北大念書去了；另一位同樣是保定團領導的邢台人張仲毅(1899-1927)，畢業後則去天津教書。對照參考保定周圍諸縣中共組織建立的情況，可以發現，與保定育德中學有直接密切關係者，可能只有完縣而已。完縣組織的創辦者韓永祿(1905-1931)早年就讀育德中學與保定省立二師，他在放假期間即曾回鄉活動。不過，韓正式建立完縣的組織要等到 1926 年 11 月，那已是他從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回鄉以後的事。所以，韓建立組織的契機，並不是在保定求學入黨的經歷。而像韓一樣在 1926 年被派遣回鄉動員農民的成員，在北方其他地區也有。這時候他們的回鄉已不是自動自發者，而是另有其他的政治動機。這一點在後面還會交待。

即使這些青年學子有意回鄉從事農民運動，但也力不從心。因為他們沒有獨立的經濟能力，若沒有家人的支持，他們如何能像沈定一般，既成立農民小學，還供農民及其子女免費入學並提供書本資料呢？青州有一位署名「昌化」的團員，原來即打算在家鄉辦一夜校，但因為其家鄉鬧土匪，又因年關忙碌，無暇顧及。兼之他的祖父是個「專制魔王」，他家的子弟動輒罰跪、挨打，平常無故不得出大門。結果辦夜校之事也就不了了之。⁴³這位團員的經歷，正說明了年輕的革命者在農民動員上的困境，以及他們為何更傾向於留在行動較自由的城市，而不是回鄉受家庭的束縛。

早期北方地區黨、團組織不重視回鄉發展活動，中共中央領導也難辭其咎。蓋中共本來就較重視城市的工人運動，所以當時中共中央派來山東的巡視員，如 1922 年的陳為人、1923 年的王振翼、1924 年

⁴³ 濟南市檔案館等編，《濟南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輯 1，〈團青州支部工作情況報告〉，1925 年 1 月 19 日，頁 140。

的尹寬(1897-1967)等，全都是為了巡視城市工作。事實上，知識份子成員在放假或畢業後回鄉，造成城市組織的流動性大，乃至被迫停頓解散，這也不是中共領導所樂意見到的。⁴⁴所以，當時中共也會培養某些有能力的青年人成為「職業革命家」，留在城市工作，如王盡美、鄧恩銘即是。在農村，此一時期的中共卻沒有供給專門做農運的職業革命家，當然也沒有提供經費給回鄉的革命者辦學校了。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在二七事件後，特別是在北京以外的北方地區，中共的組織表現出越來越強的在地性，也不再像前一階段勞組部主導下的北方革命般那樣強調鐵路工人運動。但是，此一階段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依舊執著於城市的工人運動，兼之一些生活上的考量，所以此時北方地區組織成員回鄉活動者仍舊不多。正如圖 1 所示，1924-1925 年中共在山東的組織，全都建立在膠濟路沿線的縣市。所以，在地籍成員的數量，不一定能夠保證革命必然會向農村與下層社會扎根，我們還必須考慮到中共上層的政策，以及如下兩節所述，外在政治環境的轉變。

四、1925-1926 年間北方地區中共組織的建立與發展

1925 年在北方地區共產革命運動的發展上是個轉折點。當時北方地區的政局，正處於馮玉祥與奉皖兩系聯盟對立的態勢。為此，馮玉祥至遲從 1924 年開始，即與中共和蘇聯暗中串連，承諾接受蘇聯的

⁴⁴ 如 1923 年濟南團的領導吳容滄即抱怨當地的團員，「均不肯確實負責」；「尤以值此年假期間，早已將此事(團務)擲諸九霄雲外，而回家過新年去了」。吳是浙江人，也是團中央的特派員。作為一位外來者，吳更不能體諒在地學生團員丟下團務、放假回家的現象。濟南市檔案館等編，《濟南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輯 1，〈吳慧銘關於濟南地方團工作情況致仲甫、存統信〉，1923 年 2 月 1 日，頁 32。

援助。在 1925 年 10 月，李大釗赴張家口與馮玉祥洽談，獲得後者的允准，派遣中共黨、團員到馮玉祥部做政治工作，同時由中共和蘇聯專家幫助馮玉祥成立各種軍事學校。也正是在同一時間點，中共北方各地的黨、團組織紛紛進行改組。如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兼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即是在 1925 年 10 月改組為北方區執行委員會(北方區委)，並由和馮玉祥接洽的主要人物李大釗擔任書記。在山西，中共太原特支也在同月改組為太原地執委，並由北方區委派去的河北唐縣人崔鋤人(1905-1959)擔任書記。又如在更偏遠的內蒙古地區，也都在 1925 年內由北京黨派遣幹部分赴如察哈爾、綏遠、包頭等地建立組織。

最明顯的改變發生在河南。如圖 1 所示，在 1924 年，中共在河南地區連一個組織都沒有建立，但是，到了 1925 年，中共在河南的組織卻如雨後春筍般條地在各地冒了出來，至少有 11 個縣市建立了中共的組織。這當然也是中共與國民軍合作的結果。據中共官方黨史的記載，早在 1924 年底，國民二軍胡景翼(1892-1925)即主動通過李大釗向蘇聯求援。隔年初，蘇聯代表與軍事專家親自來到國民二軍，協助後者打贏胡憨(玉琨，1888-1925)之戰，統一了河南。國民黨方面也在胡景翼入豫後，先後派遣柏文蔚(1876-1947)、李根源(1879-1965)、李烈鈞(1882-1946)、于右任(1879-1964)等人到河南，並在 1925 年 5-6 月間召開了國民黨河南省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共方面也乘此機會，從外部調派幹部進入河南，並要求立即在河南各地建立組織。⁴⁵所以河南各地的組織，才會在這個時期如此迅速地建立起來。而中共也因此，在 1925 年 10 月建立了由中央直接領導的豫陝區委，負責統轄河南、陝西兩省的組織。

因為是由中共中央從外面派人建立起來，所以我們可以發現，此

⁴⁵ 陳傳海、徐有禮，《河南現代史》，頁 61-67。

一時期河南各地組織的成員，以外來者居多。例如，在當時河南省的政治中心，也是中共豫陝區委的所在地開封，⁴⁶《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所記載 1925-1927 年間 27 位開封各級幹部，其中已經可以確定身分的 19 個人裡面，即有 13 位是外來幹部，而且他們大多是由中共中央派來河南工作。又，這 19 個人當中，有 4 位曾赴法勤工儉學，8 位曾經赴蘇聯留學。此一現象告訴了我們：第一，1925 年河南省組織是在中共中央外力的介入下，很突然地被建立起來的；第二，這些曾赴法或蘇聯留學的外來幹部，受到無產階級革命意識形態的影響較為深刻，在政治上也比較可靠，特別是那些曾赴蘇聯留學者，還可以協助蘇聯專家、中共與國民軍之間的溝通，所以中共才派遣他們來河南。由此亦可證明，此一時期河南的革命運動，是以與國民軍合作的政治軍事工作為首要任務。

在河南其他地區，如鄭州黨、團的領導黃平萬(1893-?)、余立亞(1897-1927)，也是外來幹部，而且他們也都有留法勤工儉學與赴蘇聯留學的經歷。事實上，在同時期其他北方地區也可以發現同樣的現象。例如，從 1924 年秋以來，同樣具有留法勤工儉學與在蘇聯留學經驗的趙世炎(1901-1927)、陳喬年(1902-1928)即被派到北京工作；甫自蘇聯歸國的蕭三(1896-1983)也一度於 1925 年 10-11 月間被派任中共張家口地委書記。他們不僅要負責推動北方地區的國民革命，還要擔任蘇聯專家、中共及國民軍之間的溝通橋樑。

與河南等地組織蓬勃發展的情況相反，在山東等非國民軍統治的地區，中共的組織活動反而在此一時期轉入消沉。例如山東，自奉系的張宗昌(1881-1932)於 1925 年 4 月擔任山東省軍務督辦以來，山東當局對於革命活動的監視與壓迫與日俱增。如同月於青島日資紗廠爆發

46 中共豫陝區委 1925 年 10 月中旬成立於鄭州，隔年 1 月即遷至開封。

的大罷工，即遭到張宗昌的血腥鎮壓(五·二九慘案)，中共中央特派員李慰農(1895-1925)當場遇害。前述山東的成員有許多在 1925 年赴蘇聯中山大學學習，恐怕與當局的壓迫也不無關係。如王翔千之女王辯(化名宮琦)，便是五·二九慘案後被當局通緝的 13 人之一。⁴⁷長期在山東從事革命活動的鄧恩銘，也因為在 1925 年 11 月一度被捕，獲釋後立即被調離山東，直到 1927 年八七會議後才被調回山東工作。至於山東黨、團的領導，也由外來的張昆弟及關向應(1902-1946)等人取代。

與山東的情形對比，正可以突顯國民軍的掩護與外來政治力量的介入，在 1925 年河南等地組織的建立與發展上產生關鍵作用。但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政治力量固然有助於革命勢力的發展，也成為後者的束縛。一旦外在的政治環境變遷，或與中共合作的政治團體態度改變，革命勢力的發展便可能受到阻礙，甚至遭到破壞。例如，被派去張家口作軍隊宣傳工作的中共黨團員，就被國民軍軟禁在平民教育處內，不得宣傳。⁴⁸其中張家口地委書記蕭三還被國民軍下逐客令，並在 1926 年初被調回北京，不久後就去上海工作了。⁴⁹在河南亦是如此。1925 年 4 月，胡景翼去世，岳維峻(1883-1932)繼任國民二軍軍長、河南省督辦。岳對於與中共及蘇聯的合作，採取消極，甚至排斥的態度。如中共豫陝區委書記王若飛(1896-1946)、蕭楚女(1891-1927)在 1925 年 12 月就因為不見容於岳維峻，被趕出開封。⁵⁰兩人不久後也都被調去上海、廣州等地工作。

47 濟南市檔案館等編，《濟南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輯 1，〈團濟南地委關於宮琦等人被通緝事致團中央信〉，1925 年 8 月 10 日，頁 214。

48 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 1，〈張家口地方十二月份報告〉，1926 年 1 月 21 日，頁 479。

49 樂天宇，〈大革命時期張家口地區革命活動的回憶〉，頁 89。

50 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 1，〈團開封地委關於丑侶等人被趕出開封給鍾英信〉，1925 年，頁 91。

又，根據圖 1 與表 1 可以發現，1925 年建立起來的河南地區組織，主要位於鐵路沿線的城市，而且其中許多也是依靠外來幹部新建立起來者。例如 1925 年 10 月成立的中共漯河車站支部即是由湖北黃陂籍的周天元(1892-1931)擔任書記，周是京漢路江岸機廠木工出身，曾經參加二七罷工。⁵¹1926 年 1 月成立的中共洛陽地委書記王中秀(1902-1926)是河北故城人，保定育德中學的畢業生，後進入北大就讀，1925 年主動從北大退學，向中共申請到河南工作，因此被派赴洛陽擔任地委書記；1926 年王中秀恢復了隴海鐵路總工會，並親自擔任總工會秘書主任。又如雲南彝良人劉少猷(1902-1930)、湖北黃岡人羅思危(1898-1928)、湖南醴陵人劉昌炎(1894-1927)、江西安源人朱錦棠(1895-1966)、安徽蕪湖人龔逸情(?-1928)，也都是於 1925 年被中共中央派到京漢路沿線的信陽，以及河南煤礦大城焦作工作，其中劉、朱、龔三人過去就曾在安源煤礦從事工人運動。中共當時之所以派遣如此多具有工運經驗的外來幹部到鐵路沿線城市工作，既反映了其無產階級革命的意識形態，也是由於鐵路在戰事上扮演重要角色。情景仿佛又回到了 1923 年二七事件前，中共在吳佩孚的掩護下推動鐵路工人運動的景象。

也如同二七事件前由羅章龍等外來幹部在北方各大城市建立的組織般，1925 年由外來幹部建立起來的河南鐵路沿線城市的組織，同樣也缺乏群眾基礎。其理由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些外來者難以打入基層地方社會，再則是由於當時中共只是在政治勢力的掩護下，與某些工人領袖結合，並未深入工人群眾。中共此時在河南工運上的主要成就，一是藉著國民軍的勢力，於 1925 年 2 月在鄭州召開全國鐵路總

51 周天元後來一直在武漢從事工人運動，1931 年被捕遇害。黃尚文，〈碧血寫春秋 歷盡磨難志更堅——武漢地區早期共產黨員周天元〉，頁 7-10。

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再則是透過甫被國民軍釋放的二七罷工領袖劉文松等人，成立了河南全省總工會(劉任會長)等組織。但這些會議或組織實際上是很空洞的。1925年10月，河南代表在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上便承認，河南工運太注重政治的勢力，「工會的組織發展雖很快，但只結合了上部首領，尚沒有打入群眾中去」。⁵²在北方其他地區亦是如此。如來自北京的代表也指摘，河北各地的工運工作者太依賴國民軍領袖。⁵³又，當時中共與北方工人的關係，許多仍只限於利益上的結合。如王中秀在洛陽吸收工人時，便有工人表示「要我來就得把錢與我的觀念」。⁵⁴似此在政治勢力的掩護下，只限於上層工人領袖，甚至是利益的結合，當然不穩固。因此，毫不令人意外，國民軍一退出後，北方各城市的工運組織立即崩解。在河南，1926年初吳佩孚驅逐國民二軍以後，京漢、隴海兩路的工人組織全部坍塌，想要在其中找到兩個維持組織關係的成員幾乎不可能。⁵⁵

1925年河南的工運就仿佛1923年二七事件前的北方工運般，都是由外來幹部推動，也是在政治勢力掩護下，透過利益與上層工人領袖結合。其結果都是在失去政治掩護後，立即崩潰瓦解。雖然中共一再受到相同的教訓，可是，為了迅速動員工人聲援北伐戰事，在1927年6月馮玉祥再率國民軍入豫之際，中共復故技重施，依賴劉文松等工人領袖迅速地建立起工會。但劉等人原來也是出於自身利益與中共結合者，在河南工人中便有「共產黨收買革命」的謠傳。⁵⁶在國共分

52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河南報告決議案〉，頁502。

5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京區報告決議案〉，頁496。

54 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1，〈團洛陽特支關於洛陽工作情況給團中央的報告〉，1925年12月5日，頁62。

55 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1，〈團豫陝區委四月份報告大綱〉，1926年5月9日，頁161。

56 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2，〈河

裂後，劉等人立即叛變，有的還拐帶工會的款項潛逃，不顧尚在罷工中的工人。如前所述，這些人後來都成了中共眼中的工賊。中共在北方鐵路工人間的努力，完全付諸流水。⁵⁷

雖然 1925-1926 年間的北方地區革命運動，在許多方面頗類似 1923 年二七事件以前的景況。不過，與 1923 年以前不同者，即 1926 年後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並沒有因為 1925-1926 年間河南等地革命運動的挫敗而後退消沉，反而更進一步地向外，並轉向農村底層發展開來，成為北方地區共產革命運動在 1927 年 7 月國共分裂以後還能繼續存在的關鍵。這是下一節所欲討論者。

五、1926-1927 年間北方地區中共組織的建立與發展

如表 1 與圖 1 所示，1925 年以後到 1927 年國共分裂為止，中共在北方地區的革命活動是不斷地向外擴大發展，並沒有因為 1925-1926 年間短暫的挫折而中斷。以東北地區為例。如前所述，在 1925 年以前，中共早已透過楊志雲、傅景陽等人的努力，在大連等地建立了組織。1925 年中共與國民軍的合作，也一度給東北的組織打了一劑強心針，如傅景陽等人在 1925 年 2 月間即曾赴在國民二軍占領下的河南鄭州參加全國鐵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會，5 月間又赴廣州參與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並帶回中央即將派遣一人到東北指導工作的消息，讓東北組織的成員非常興奮。⁵⁸但是，頻頻的舉動也引起當局

南工運報告》，1927 年 10 月 03 日，頁 131。

⁵⁷ 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 2，〈河南省委致京總黨團的信〉，1927 年 10 月 16 日，頁 179。

⁵⁸ 中央檔案館等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 1，〈團大連特支給團中央的報告〉，1925 年 5 月 25 日，頁 60。

的注意，傅景陽及其所領導的中華工學會即遭到監視，後來傅本人也於 1926 年遭到逮捕。⁵⁹但是，大連及整個東北地區的組織並未因此停頓。相反的，在 1926 年 9-10 月間，中共相繼在瀋陽、大連與哈爾濱，成立奉天特支、大連地委與北滿地委，並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不再由北方區委領導，這是因為北京自 1926 年下半年以來在當局的壓迫下，李大釗等北方區委幹部紛紛隱藏或赴外躲避的緣故。⁶⁰無論如何，中共並沒有因為 1925-1926 年間的挫敗而停止組織活動，正如表 1 所示，東北地區如長春、牡丹江、安達等地的許多組織，全都是在 1926 年 10 月後，即客觀環境惡化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

那麼為何北方地區的中共組織，在 1926 年以來「反革命」勢力佔優勢的環境下反而能夠逆勢成長呢？首先，正由於敵人的壓迫，使得中共更加注意秘密工作的重要性，藉此改造強化自身的組織。團濟南地委在 1926 年 2 月即指示建立支部組織，以及強化組織紀律。⁶¹支部的建立，有助於黨、團扎根在群眾中間，也便於成員隱藏身分，而且不同支部的成員間互不認識，這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下，可以使組織受到的傷害降到最低。⁶²一般認為，中共要到 1926 年 7 月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才要求全黨注意建立支部工作，⁶³而北方地區的組織更早注

59 中央檔案館等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 1，〈中共大連地委關於五月份工作情況給北方區委的報告〉，1926 年 6 月 8 日，頁 150。
傅景陽於 1927 年 3 月獲釋，但也從此與中共失去組織上的關係，於 1942 年病逝。

60 劉道華、黃小同，《中共北方地區黨史研究》，頁 79-80。

61 濟南市檔案館等編，《濟南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輯 1，〈團濟南地委關於組織問題的報告〉、〈團濟南地委關於紀律問題的報告〉，1926 年 2 月 18 日，頁 291-303。

62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4，〈中央通告第四十七號〉，1928 年 5 月 18 日，頁 202-203。

63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2，〈組織問題決議案〉，頁

意到建立支部的重要性，恐怕也是環境壓迫的使然。

再者，雖然客觀的壓迫變得較前厲害，但當時北方各省的統治當局，由於各式各樣的內憂外患，其對於共產黨的防備，也就不能不顧此失彼。如張宗昌自 1925 年 4 月統治山東以來，於該年 10 月就要抵禦南方孫傳芳(1885-1935)浙軍的進攻，隔月又要面對進襲魯西南的岳維峻國民二軍；1926 年初，張宗昌再應張作霖(1875-1928)的要求，率領直魯聯軍進攻河北，協助圍剿國民軍。因此，張宗昌對內不僅自顧不暇，而且為了應付戰事所需之故，對於工人與農民的壓迫與剝削更是變本加厲，以致山東各地群眾自發性地起來抗爭，反而給予中共擴張勢力的機會。在這樣的環境下，如濟南團雖然自我批評尚不夠努力，但團員在 1926 年上半年的 6 個月內，也從原本的 87 人發展到 233 人。⁶⁴在河南亦是如此。雖然 1926 年初吳佩孚重回河南，給予中共在河南相當大的衝擊，特別是城市地區的組織。但是，由於吳佩孚勢力所能統治的有效範圍太小，內部又充斥矛盾；⁶⁵兼之吳佩孚是靠地方紅槍會之助才得以擊敗國民軍，但他在回豫後既沒有給予槍會合法的地位與重用槍會領袖，反而刀戈相向，導致河南各地槍會起來反抗。⁶⁶因此，1926 年以來，中共在鄭州、洛陽、駐馬店等地的組織雖然遭到破壞，但在河南的政治中心開封與杞縣等地的組織不僅未受損失，反而呈現

182-184。

⁶⁴ 濟南市檔案館等編，《濟南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輯 1，〈團濟南地委關於半年來工作概況的報告〉，1926 年 7 月 14 日，頁 398-399。

⁶⁵ 根據國民黨方面的檔案，當時河南內部因為有河南省長靳雲鶚與河南督辦寇英傑之爭，故對於民眾與黨務，「並不採取任何嚴重壓迫的態度」；所以當時國民黨的組織，是處於一種秘密的公開形式。黨史館，部 11309，〈劉峻山視察直隸河南黨務報告〉，1926 年 6 月 17 日。

⁶⁶ Odoric Y. K. Wou,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pp. 67-69.

逆向成長的趨勢。⁶⁷

事實上，開封、杞縣組織的發展，還與當時中共積極地在北方農村地區發動革命，以配合北伐軍事運動的展開，有密切關係。原來，當 1925 年中共重新在河南建立組織之際，他們雖然仍以城市工運為重心，但也開始注意到農村的農民運動，如當時中共就在滎陽建立了農民協會。只是滎陽的農協是由外來者建立起來的，而且接近鐵路沿線，所以當吳佩孚重回河南後就被完全摧毀了。不過，當時中共在開封也吸收了許多來自豫東杞縣農村的知識份子，如馬沛毅(1906-1932)、張海峰(1902-1981)、吳芝圃(1906-1967)等人。這些知識份子如張海峰者，雖然在 1925 年即已回鄉活動，但杞縣革命運動要到 1926 年以後才有顯著的突破(中共杞縣地委與農協即成立於 1926 年 2 月)。因為杞縣的紅槍會就是曾幫助吳佩孚驅走國民軍，結果卻遭到吳佩孚的鎮壓而起來反抗者。當時中共就乘機透過張海峰等人的關係，吸收杞縣槍會首領加入共黨，並且將六千餘名槍會會眾編入農協與農民自衛團。⁶⁸在北方其他地區，如山東的青州，如前所述，中共很早就在該地建立組織，但沒有進一步向農村扎根。1926 年開始，中共在青州建立了農民協會，吸收農民加入組織。⁶⁹1926 年 10 月，中共山東地委派宋伯行(1892-1928)赴青州等地，建立青州、壽光、益都地委，領導該地區的農村組織。據國民黨方面檔案的記載，當時山東各地同樣是槍會、土匪遍起，這些革命者下鄉也是為了聯絡槍會、土匪起來反抗張宗昌。⁷⁰

67 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 1，〈團豫陝區委四月份報告大綱〉，1926 年 5 月 9 日，頁 152。

68 周濟然，〈杞縣紅槍會統述〉，頁 83。

69 濟南市檔案館等編，《濟南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輯 1，〈團青州支部關於改組三個月來的工作情況致團中央信〉，1926 年 5 月 31 日，頁 377。

70 黨史館，部 11618，〈山東省政治及黨務報告〉，1926 年 9 月。

從組織史資料可知，在同一時期其他的北方地區，中共也開始派遣成員下鄉進行組織活動。如河南睢縣的于秀民(1902-1994)、長葛的郭安宇(1899-1964)、南陽的楊士穎(1903-1931)與劉友三(1899-1942)、駐馬店的張家鐸(1902-1929)、桐柏的金孚光(1907-1931)、永城的蔣一峰(1904-1931)、商丘的徐華章(1902-1967)、臨潁的韓光甫(1907-1951)、固始的蔡仲美(1900-1930)等人。在山東，如沂水的王敬齋(1902-1950)、禹城的李宗魯(1901-1940)、平原的延伯真、楊笙甫與王旭鵬(1907-1928)諸人、陽穀的楊耕心(1900-1943)、聊城張廷煥(1903-1931)，還有廣饒人耿貞元(1890-1932)在 1926 年冬於臨淄縣北部建立農村白兔丘支部等。在河北，除前述完縣的韓永祿，還有玉田的張明遠(1906-1998)、饒陽的王斐然(1904-1994)、順德的沈國華(1906-1975)、文安的張宗義(1897-?)，以及大名的馮品毅(1900-1930)與李素若(1906-1938)等人。沉寂許久的山西也於此時由太原地委派外來幹部崔鋤人，以及在地籍的周玉麟(1906-1928)等人，赴平陽、晉城等地建立組織。

雖然這裡不可能詳細交待上述各人的經歷，但根據筆者對這些人資料的爬梳，可以發現：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 1926 年後才回鄉活動，少數如郭安宇與張宗義在 1925 年即回鄉活動，但他們的家鄉也要到隔年才正式建立組織。從這個時間點就可以知道，這些人是在中共的指示下回鄉活動。如在 1926 年 2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特別會議中就指出，為了配合北伐，必須要加強農民的工作，特別是在北方地區。⁷¹當時正在上海大學就讀的南陽學子楊士穎就是在北京特別會議後，被中共派回南陽工作，而且其首要任務就是聯繫槍會領袖。⁷²

又，這些下鄉工作者，除了于秀明、延伯真等少數人外，大多是當地出身的回鄉知識份子。這就證明前面所述，即在地出身的幹部有

71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2，〈關於現時政局與共產黨的主要職任議決案〉，頁 53-57。

72 薛書林，〈南陽老人譜(59) 楊士穎〉，頁 125。

助於革命的向下扎根。這是因為中國農村具有強烈的地域排他主義，若沒有在地人的幫助，外來者很難打入其中。再者，這些在地幹部許多都是以教師的身分作掩護進行活動，如張明遠本人就是玉田小學教師出身，馮品毅是赴大名七師任教，李宗魯也是回禹城的高小任教。這一方面是因為農村教師較容易影響與吸收農村知識份子，而且如前所述，農村教師的薪資低，對時局也頗感不滿，所以其自身也容易受到革命影響。如張明遠當時在玉田一開始就是著手農村教師的抗議運動。再者，農村教師頗受農民尊敬，有領袖地位，甚至他們許多人就是農村紅槍會的領袖，或至少與槍會首領有關係。事實上，上述黨、團員絕大部分都是回鄉從事槍會運動。也難怪當時中共很重視鄉村教師，說他們是「農村中天然的指導者」，應努力吸收這部份人。⁷³

正是為了聲援北伐，所以中共在 1926 年以後，開始有意在遠離鐵路沿線與政治中心的北方農村地區建立組織，因此在河南等敵對勢力統治的區域，中共組織的發展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呈逆向成長的趨勢。在陝西等為國民軍所佔領的西北地區，更可以明顯看出中共組織發展與北伐的關係。

筆者在此先就中共陝西省委等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組織史資料》所記載的 1927 年國共分裂以前，作為中共組織重要據點的陝西四大縣市(西安、渭南、三原、綏德)的縣、市級以上黨幹部進行分析。⁷⁴在所記載的 38 名黨幹部中，除去 7 名身分不詳者外，其他人根據其求學與出身來分類，大概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陝西出身，曾赴北京、

73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2，〈農民運動決議案〉，頁 214。

74 中共陝西省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組織史資料》，頁 12-74。

按：當時陝西尚無縣委、市委。這裡的縣、市級幹部，係指此四大縣市除去省級領導外的最高領導單位幹部，唯渭南一地尚包括該地區最早成立的赤水特支幹部在內。

武漢、上海等外地求學者；第二，非陝西出身的外來幹部；第三，陝西出身，在參加陝西的革命運動前，未曾外出求學者。其中又以第一種類型的人最多，共 15 人，佔 38 名黨幹部中將近 40% 強的比例。這些人中，又以赴北京求學者最多，共 9 人；赴上海者 3 人，赴武漢者 2 人；赴南京者 1 人。1925 年以前，在陝西地區活動的革命者，主要就是這批人。他們大部分在畢業後，回陝擔任教師職務，從事教育工作。有的如渭南的王尚德(1891-1946)者，還自己建立了赤水職業學校，成為中共在渭南最早的組織據點。

這些陝籍出身，且曾赴外求學的回鄉革命者，雖然早在 1925 年以前就已回陝活動，而且他們有的亦頗富革命熱誠，其中著名者如綏德的李子洲(1892-1929)、興平的魏野疇(1898-1928)等人，他們在北京時已組織共進社，團聚陝籍赴京求學的青年學子，傳播革命思想。可是，他們回陝以後，大多也只限於知識份子與上層人士的串聯。如李子洲回陝以後，即透過陝西地方名流杜斌丞(1888-1947)、郝夢九等國民黨員兼共進社社員的關係，先後擔任榆林中學、綏德省立四師的校長，並在擔任四師校長期間，邀請王懋廷(1898-1930)、田伯英(1891-1970)等知識份子來校任教，同時吸收他們加入組織。⁷⁵魏野疇回陝以後，也是透過杜斌丞的關係先後到榆林中學、西安一中與三中等校任教，而且他還透過杜認識了楊虎城(1893-1949)。後來楊創辦三民軍官學校，即邀請魏擔任政治部主任。國共分裂後，魏無法立足陝西，也是去投靠楊虎城，隨楊部到皖北地區活動。⁷⁶

無論如何，這些回陝的革命者，並未立即著手動員群眾，連城市工人運動也不甚重視。蓋當時陝西缺乏現代產業，如省會西安的工人

75 張守憲等，〈李子洲〉，頁 82-83。

76 張守憲等，〈魏野疇〉，頁 160；楊瀚，〈楊虎城大傳〉，頁 32、38。

全為手工業工人，即或有較新的電燈廠及製革廠，人數也不多，所以陝西並沒有現代產業工人運動的需求。⁷⁷因此，正如三原共青團的報告：「此地沒有工人，所能作的，只有青年學生運動」。⁷⁸所以在 1925 年以前，陝西地區的革命運動只限於少數知識份子，甚至由這些知識份子成立的共進社、共青團等組織，內部亦相當鬆散，乃至彼此間齟齬分裂。更何況不是所有在外求學的陝籍知識份子都如李子洲等人般熱中於回陝活動。如同樣是共進社成員的武止戈(1902-1933)，他在 1924 年進入上海大學，後來又被選派赴蘇聯學習，只是在赴蘇前夕一度被派回西安建立團的組織而已。

在 1925 年 10 月後，如同河南的情形般，為了推動與國民軍的合作，中共才派遣外來幹部到西安，建立了正式的黨、團組織，歸豫陝區委領導。如西安、三原、赤水(渭南)都是在 1925 年 12 月，開始建立中共的特別支部。前述第二類型非陝西出身的外來幹部，即是在此一時期加入到陝西的革命行列，如安體誠、吳化之(1902-1990)、耿炳光(1899-1972)等人即是在此時被派來陝西建立組織。不過，與同一時期赴豫的外籍幹部不同，此時赴陝的外籍幹部人數較少，而且他們大多由北方區委或豫陝區委而非中共中央派遣來陝，有留法勤工儉學或赴蘇聯留學經驗者也只是少數(只有由豫陝區委派來工作的黃平萬有留法與赴蘇的經驗)。可見此時陝西並不如河南受到重視，這與當時陝西尚非國民軍的主戰場應當不無關係。不過，也是在此一時期，陝西各地的

77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 1，〈團西安地委關於政治、宣傳、組織等情況給團中央的報告〉，1926 年 1 月 31 日，頁 126。

78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 1，〈團三原支部關於夏令講學及團務工作等給團中央的報告〉，1925 年 8 月 9 日，頁 389。

組織開始著手從事農民運動，如渭南的組織將驅趕教育局長的工作改為農村工作，並在赤水鎮等地建立了農協；西安的組織也在郭杜鎮著手組織農協。⁷⁹如同北方其他地區般，此時陝西組織開始著手組織農協，也是出於上面的指示，為配合國民軍軍事行動的緣故。⁸⁰

1926年，陝西的革命運動也歷經了一段低潮。在該年3月，吳佩孚派遣劉鎮華(1883-1956)部進攻、圍困西安長達七、八個月，直到該年11月才解圍。當時負責領導陝西組織的中共西安地執委，也因為西安被圍，與各地的組織失去了聯繫，無從領導各地活動。⁸¹

然而，在西安解圍以後，陝西反而成為北方地區革命最重要的據點。這主要是因為直隸、山東、河南等省相繼被敵對勢力佔領，陝西成為國民軍的根據地、主戰場的緣故。1926年9月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後，即將所部改編為國民聯軍，欲經甘肅，入陝解圍，然後連晉圖豫。因此，中共為了呼應，同時也是在國民軍的掩護下，開始在陝西、甘肅各地相繼成立組織。如表1、圖1所示，1927年西北甘肅、陝西地區新建的組織，全都是沿著國民軍進軍的路徑建立起來的。先是銀川

⁷⁹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1，〈團西安地委關於政治、宣傳、組織等情況給團中央的報告〉，1926年1月31日，頁127。

⁸⁰ 在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上，中共中央即要求各地組織農民協會與農民自衛軍，其中河南代表(當時陝西組織仍屬豫陝區委所轄)的報告即指出，他們已組織了有15個村的農民協會，其中當然也包括前面提到的滎陽農民協會。可見得1925年河南、陝西等地開始組織農民協會是出於中共中央的指示，其目的也如該會議所指出，是要支援國民革命運動，以及馮玉祥的國民軍。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中國現時的政局與共產黨的職任議決案〉、〈河南報告決議案〉，頁462-464、501。

⁸¹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冊2，〈陝西省委第一次擴大會議的黨務報告〉，1927年9月26日，頁81-82。

的寧夏特支，然後是甘肅的平涼特支，接著就是陝西西部的旬邑、岐山等縣；在馮玉祥於 1927 年 3 月發布討奉布告後，陝西的組織又進一步向西安北方的銅川、合陽，東方的臨潼、潼關，以及與河南接壤的丹鳳等地擴展。這些地區的組織，絕大部分都是為了配合國民軍的軍事行動而首次建立。

而且，如同前述河南等地的情形般，當時中共也開始派遣大批成員，深入陝西農村地區進行組織活動。如陝西渭南人李維屏(1900-1945)、蒲城人亢心栽(1906-1978)，都曾於 1926 年 5 月參加由毛澤東主持的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然後於年底被派回陝西動員農民，並獲陝西農民熱情響應。蓋陝西長年兵連禍結，尤其在西安圍城期間，鎮嵩軍劉鎮華部行徑殘暴，令人髮指。其經過之地，無不燒殺擄掠，許多婦女慘遭姦殺，或被逼迫而跳井、上吊、自殺等，農民對其恨之入骨，以致各地紛紛興起紅槍會等自發性武裝組織。因此，也如同前述河南等地般，這些農運人員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聯絡陝西農村紅槍會等自發性武裝組織。⁸²

再從組織的成員進行分析。1926 年 8 月，中共中央決定改組豫陝區委為豫區執委，專門管理河南的黨務工作。至於陝西地區，中共中央也於該年 12 月成立陝西黨團聯席會議(隔年 2 月改組為陝甘區執委)，作為陝西、甘肅地區最高的黨務領導機構。如前所述，在 1925 年初中共為了配合國民軍的活動，必須立即重建河南的組織，所以當時他們派遣了許多外來幹部進入河南。1925 年 10 月成立的豫陝區委的 12 位委員，即全部都是外來者(只有大名出身的馮品毅勉強可以算是一個河南人)，其中 7 位有赴俄學習的經驗，這 7 位裡面又有 4 位曾有赴法勤工儉學

⁸² 黨史館，部 10953，〈中央農民部陝西省辦事處第一次報告〉，1926 年 10 月 23 日。

的經歷。這些具赴俄經驗者，還可協助中共、蘇聯專家，以及國民軍之間的溝通。不過，在豫陝區委裡負責工運、農運者卻沒有赴國外留學的經驗，其中從事工運者是有長期北方工運經驗的李震瀛(1900-1938)，農運負責人是蕭人鵠(1898-1932)。為何會派蕭去河南作農運，可能與他是湖北組織的成員有關。蓋河南以及陝西組織，與早期湖北組織有密切關係。湖北黨很早就開始派遣在武漢求學的豫、陝籍學子回鄉建立農村組織，像是前述渭南的王尚德，以及豫東南的商城、光山、潢川等地的組織成員多是如此。所以蕭人鵠被派去河南做農運，恐怕與此有關。至於 1926 年 8 月由豫陝區委改組成立的豫區執委，大體上是留任的豫陝區委成員，只加上一位河南光山籍的汪後之(1900-1928)，他就是在武漢入黨，然後被派回光山建黨的。蕭人鵠也獲得留任，他還是 1926 年 4 月成立的河南省農民協會的委員長，而副委員長張海峰則是杞縣黨員兼紅槍會領導，由此亦可看出農民與槍會運動已成為中共河南黨的重點工作。

至於陝西。如前所述，中共在 1925 年派赴陝西工作的外來幹部不如派赴河南者多，所以陝西組織裡在地籍成員的比例一直較高，這是與河南組織不同者。1926 年 12 月陝西黨團聯席會議的 5 位委員中，就有 3 位是陝西籍；另 2 位外來幹部是 1925 年底即來陝工作者，其中 1 位是自豫陝區委轉任的黃平萬，另一位則是湖北漢川籍的吳化之。1927 年 2 月成立的陝甘區委也是以在地籍成員居多，7 位成員中只有一位是外來幹部(四川籍的陳家珍)，也只有他有赴俄留學經驗。又，前述第三類型的陝西革命者，即陝西出身卻未曾外出求學者，大多也是在此時期開始嶄露頭角。他們大部分是知識份子，許多在 1925 年前後受到那些曾外出求學後回陝的第一代陝籍革命者的影響才加入革命的行列，有的就是魏野疇等第一代陝籍革命者的學生，所以較為年輕。像是後來成為陝西省委書記的杜衡(1907-1965)、涇陽的耿覺(1905-1929)、臨潼的

景瑞卿(1906-1968)、興平的李仁軒(1905-1989)、岐山的李琦(1904-1968)、乾縣的王炳南(1908-1988)、旬邑的許才升(1903-1928)等人，他們大部分是1900-1910年間出生者，不像魏野疇等第一代陝籍革命者是1900年前出生。根據《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的記載，在1927年陝西新建的20個縣市組織中擔任幹部的35人中，除出身不詳的14人外，有18人於1900年後出生，只有3人出生於1900年前，這些人大多即是甫被提拔起來的年輕一代革命者。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從豫陝區委到陝甘區委，中共在北方地區的組織有逐漸在地化的趨勢。而這樣的在地化，顯然是為了方便打入農村，動員農民，以配合北伐的軍事行動。正如陝甘區委在1927年3月所言，現在「就是農民革命的時期」，「陝西最重要的工作為農民運動」。⁸³這也正說明了為何中共從1926年底開始，派遣如此大量年輕的(有的還不滿20歲)知識份子回鄉建立組織。

總結地說，農民運動終究是為了上層軍事、政治目的服務。從陝甘區委成員的身分來看，除了亢心栽是明顯有農運背景者外(曾赴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其餘的成員大多與軍運有關。如書記耿炳光於1925年來陝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聯絡陝北的井岳秀(1878-1936)，魏野疇則是早就與楊虎城相當熟稔，劉天章(1893-1931)曾在豫陝區委軍委工作，李子洲與陝西上層名流往來密切更是無庸贅言。這樣的背景，也告訴我們，中共當時在北方地區的目光，主要依舊是集中在上層的政治、軍事工作。

⁸³ 康民、秦生，《西北高原起春雷——西北五四運動與大革命史》，頁251。

六、結論

這篇文章，首先證明了從組織史的視角切入研究中國共產革命史的可行性。透過組織史的分析，我們得以看出早期中國共產革命發展過程中，甚少為人注意到的一些特點。

首先，根據本文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一開始就表現出強烈的外來性格。此一外來性格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作為早期北方革命領導機構的北京黨，以外來幹部居多，如早期北京黨的成員張國燾、羅章龍等人。第二，這些外來幹部所關注的焦點，是上層的政治，以及根據馬克思主義所規定的現代產業工人之無產階級革命，如張國燾等人便以北方地區的鐵路工人運動為其工作重心。第三，這些外來幹部非常依賴上層的政治而不是在地群眾的力量推動工作，如二七事件前中共與吳佩孚的結合便是例子。

在 1923 年二七事件以後，雖然北方地區共產革命的在地性格逐漸增強，但是其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偏重，以及對政治力量的依賴，依舊如故。如 1923 年後山東地區組織的成員雖然以在地籍知識份子居多，但他們大多傾向留在城市活動。1925 年河南等地區勃興的革命組織，也是在國民軍的掩護下，由中共派遣外來幹部所建立的，而且當時這些外來幹部關注的焦點也是上層政治，以及鐵路等現代產業工人運動。政治力量的掩護，以及鐵路的運輸，使得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得以橫向且迅速地向外擴展開來。但是，其最大的缺點也在於缺乏縱向的在地群眾基礎。一旦外在政治環境變動、外來幹部的撤離，都可能導致革命組織的崩潰瓦解。1923 年二七事件後北方地區革命的挫敗，以及 1926 年國民軍的撤退導致河北、河南等地工人組織的坍塌便是例子。

從這點看來，霍夫亨茲所謂中共較依賴外來政治、組織力量推動共產革命，並不是沒有道理。可是，即使是外來性格如此強烈的早期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也不可能單單依賴外來幹部與政治、組織的力量展開。所以，羅章龍等人還是要透過工人間的同鄉關係或老君會等傳統團體吸收工人；貴州出身的鄧恩銘如果沒有山東在地籍成員的幫助，也不能與青島四方機廠的工人領袖郭恆祥取得聯繫。事實上，山東地區的中共組織，本來就是依賴王樂平等在地出身的國民黨員的關係所建立的。1925 年以後，中共為了配合國民軍與北伐的軍事行動，在河南、陝西等北方的農村地區，積極擴展革命組織，以動員農民，更強化了北方地區共產革命在地性格的一面。因為這些農村地區組織，許多都是依賴在地出身的成員，透過個人的關係、地方的傳統文化以及紅槍會等既存團體建立的。由此可見，古德曼等人在提到革命的生態學時，較強調共產革命因地制宜的特性，也就是革命的「在地化」，是有其道理的。

但是，至少此一時期北方地區共產革命的在地性格是被包覆在外來性格當中。如果沒有外來政治與組織力量的推動、中共與國民軍的結合，以及為了配合北伐軍事的開展，1925 年以後河南、陝西等在地籍的成員也不見得會回鄉活動，那些紅槍會等既存團體也不可能自發地生成現代性的革命組織。中共要與國民軍合作以後，才開始匆促地把革命勢力向農村擴展，這也說明了 1925 年以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北方農村地區組織，其本身是極其不穩固的。而且，也如前述陝甘區委的成員多是負責上層軍事工作一事，可以看出農村革命的展開終究是為上層政治軍事的目的服務。這也預示了 1927 年 7 月國共分裂以後，北方許多地區基層革命組織將不可避免地迅速垮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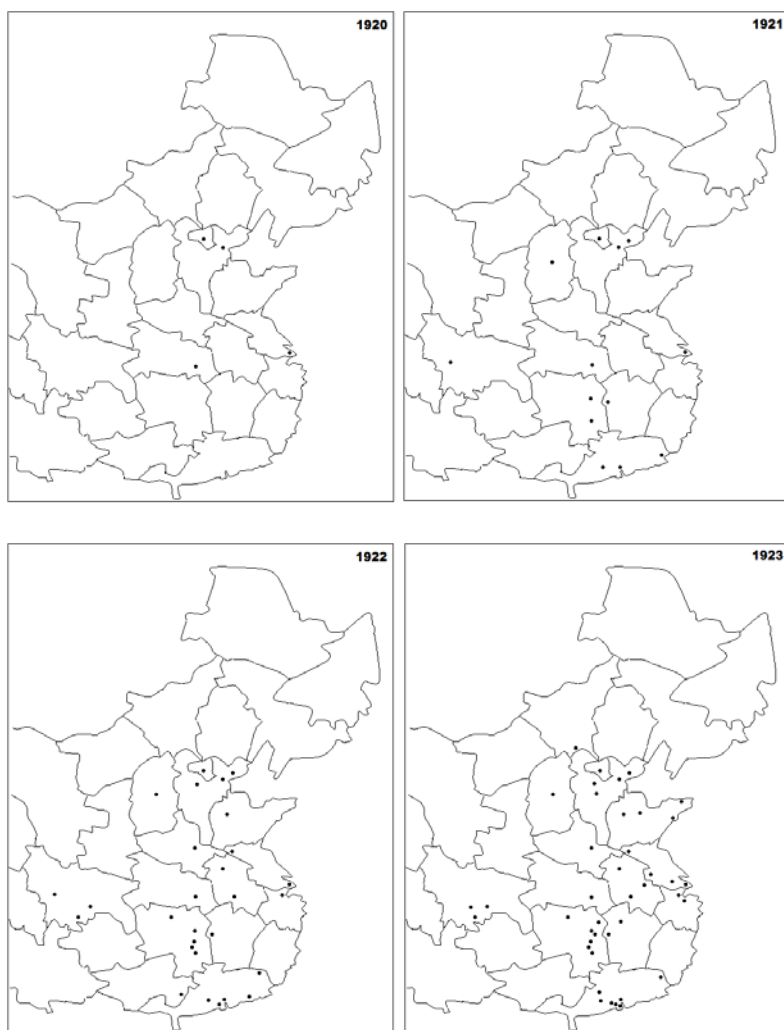
（本文於 2014 年 9 月 14 日收稿；2014 年 12 月 12 日通過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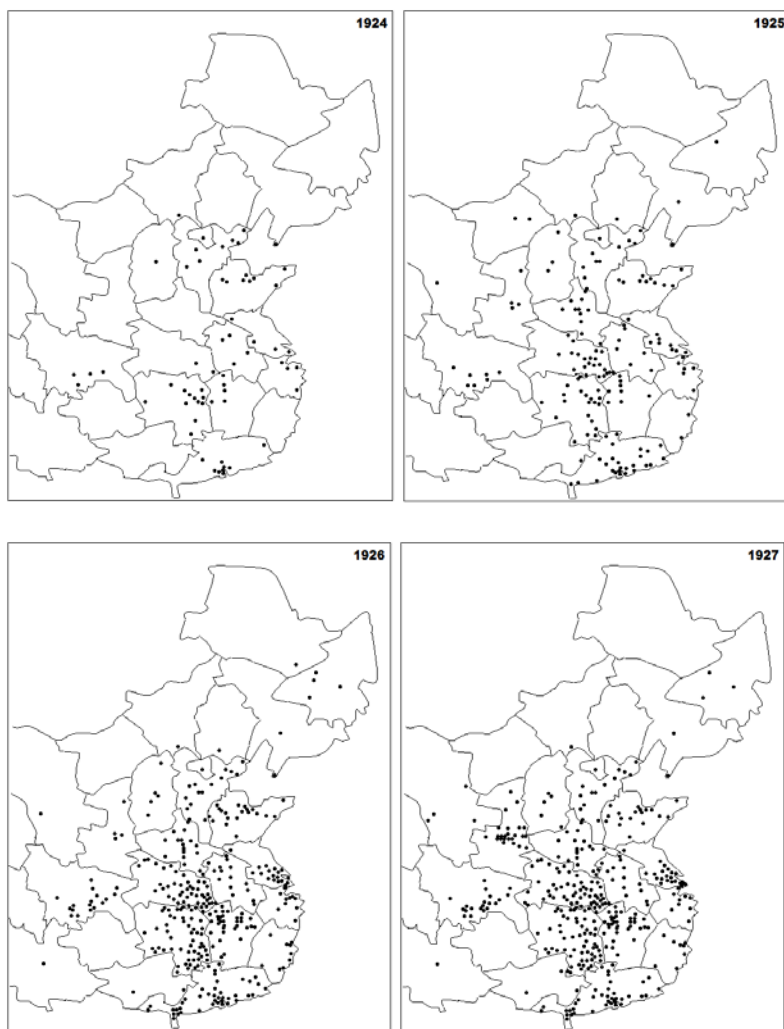
表1 1927年以前北方地區中共革命組織分布表

時間	分布地區
1920 年	北京、天津
1921 年	北京、天津、唐山、太原
1922 年	北京、天津、唐山、保定、開封、濟南、太原、徐州
1923 年	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安平、開封、濟南、淄博、青島、煙臺、太原、張家口、徐州
1924 年	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安平、樂亭、山海關、石家莊、濟南、淄博、青島、煙臺、益都(青州)、壽光、廣饒、齊河、太原、張家口、大連、徐州
1925 年	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安平、樂亭、山海關、石家莊、饒陽、順德(邢台)、磁縣、開封、鄭州、漯河、衛輝、洛陽、信陽、焦作、彰德(安陽)、長葛、商城、滎陽、濟南、淄博、青島、煙臺、益都(青州)、壽光、廣饒、齊河、濰縣、高密、太原、大同、汾陽、西安、綏德、渭南、三原、蘭州、張家口、承德、歸綏、包頭、大連、瀋陽、哈爾濱、徐州
1926 年	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安平、樂亭、山海關、石家莊、饒陽、順德(邢台)、磁縣、玉田、完縣、隆平、大名、文安、開封、鄭州、漯河、衛輝、洛陽、信陽、焦作、彰德(安陽)、長葛、商城、滎陽、杞縣、許昌、南陽、駐馬店、鄆城、潢川、淮陽、濟南、淄博、青島、煙臺、益都(青州)、壽光、廣饒、齊河、濰縣、高密、臨淄、棗莊、曲阜、泰安、萊蕪、禹城、平原、陽谷、高苑、冠縣、太原、大同、汾陽、榆次、平陽(臨汾)、西安、綏德、渭南、三原、蘭州、張家口、承德、大連、瀋陽、哈爾濱、長春、安達、海林、雙城、徐州
1927 年	北京、天津、唐山、安平、樂亭、山海關、順德(邢台)、磁縣、玉田、完縣、隆平、大名、文安、正定、開封、鄭州、漯河、衛輝、洛陽、信陽、焦作、彰德(安陽)、商城、杞縣、許昌、南陽、駐馬店、鄆城、潢川、睢縣、桐柏、商丘、扶溝、臨潁、固始、濟南、淄博、青島、煙臺、益都(青州)、壽光、廣饒、高密、臨淄、棗莊、曲阜、泰安、萊蕪、平原、陽谷、昌邑、沂水、聊城、太原、汾陽、平陽(臨汾)、晉城、西安、綏德、渭南、三原、涇陽、延安、榆林、臨潼、咸陽、興平、岐山、乾縣、旬邑、潼關、禮泉、戶縣、商縣、丹鳳、藍田、同官(銅川)、華陰、合陽、武功、澄城、蘭州、平涼、導河(臨夏)、銀川、張家口、大連、瀋陽、哈爾濱、長春、牡丹江、徐州

資料來源：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第 1 卷，頁 91-260。

圖1 1920-1927年中共革命組織分布圖





資料來源：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1卷，頁91-694。

徵引書目

一、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典藏檔案

部 10953，〈中央農民部陝西省辦事處第一次報告〉，1926 年 10 月 23 日。

部 10999，〈北京特別市黨部工人部五月份報告〉，1927 年 7 月 4 日。

部 11309，〈劉峻山視察直隸河南黨務報告〉，1926 年 6 月 17 日。

部 11618，〈山東省政治及黨務報告〉，1926 年 9 月。

二、史料彙編

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97-1999。

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3-1984。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94。

中央檔案館等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8-1991。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 1 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中共陝西省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組織史資料》，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

濟南市檔案館等編，《濟南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濟南：濟南出版社，1991-1999。

三、近人論著

〈王哲同志談王樂平情況〉，《山東黨史資料》，22(濟南，1986)，頁 65-66。

丁維汾，《山東革命黨史稿後編》(上)，臺北：山東革命黨史編纂委員會，1971。

- 丁龍嘉、張業賞，《王盡美》，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中國共產黨山西歷史(1924-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 山東省廣饒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饒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95。
- 市地名辦公室，〈育德中學的革命活動〉，《保定文史資料》，1(保定，1984)，頁 101-105。
- 耒陽市志編委會編，《耒陽市志》，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3。
- 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周濟然，〈杞縣紅槍會統述〉，《杞縣文史資料》，2(杞縣，1987)，頁 77-91。
- 青州市志編纂委員會編，《青州市志》，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
- 姜德輝，〈唐山農村黨組織的建立〉，收入河北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河北文史資料全書·唐山卷》，石家莊：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頁 170-172。
- 商海，〈安平縣黨組織創始人弓仲韜〉，收入河北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河北文史資料全書·衡水卷》，石家莊：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頁 5-8。
- 商海，〈李錫九的革命生涯〉，收入河北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河北文史資料全書·衡水卷》，石家莊：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頁 1-4。
- 常德市志編纂委員會編，《常德市志》，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
- 康民、秦生，《西北高原起春雷——西北五四運動與大革命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 張守憲等，〈李子洲〉，收入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卷 7，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頁 77-100。
- 張守憲等，〈魏野疇〉，收入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卷 5，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頁 131-174。
- 張明遠，《我的回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 張業賞、丁龍嘉，《鄧恩銘》，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 曹仲彬，〈何孟雄〉，收入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卷 49，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 198-233。
- 陳傳海、徐有禮，《河南現代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 黃尚文，〈碧血寫春秋 歷盡磨難志更堅——武漢地區早期共產黨員周天元〉，《武漢文史資料》，136(武漢，2004)，頁 7-10。
- 黃啟權，〈王荷波〉，收入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卷 12，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頁 39-64。

- 楊瀚，《楊虎城大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7。
- 趙志華，〈安徽最早的黨組織——壽縣小甸集特別支部的建立和發展〉，《安徽文史資料》，4(合肥，1982)，頁 8-14。
- 劉道華、黃小同，《中共北方地區黨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 樂天宇，〈大革命時期張家口地區革命活動的回憶〉，《河北文史資料》，8(石家莊，1981)，頁 84-108。
- 薛書林，〈南陽老人譜(59)楊士穎〉，《南都學壇》，2001：4(南陽，2001)，頁 125。
- 羅章龍，《椿園載記》，北京：東方出版社，1989。
- Benton, Gregor. "Conclus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orth and Central China in the Anti-Japanese Resistance," in Chongyi Feng and David S. G. Goodman eds. *North China at War: The Social Ecology of Revolution, 1937-194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pp. 189-223.
- Brandt, Conrad.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924-192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Feng, Chongyi and David S. G. Goodman. "Introduction: Explaining Revolution," in Chongyi Feng and David S. G. Goodman. Lanham eds. *North China at War: The Social Ecology of Revolution, 1937-1945*. MD;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 pp. 1-23.
- Galbiati, Fernando,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Hofheinz, Roy, Jr. "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 Rural Influence Patterns, 1923-1945," in A. Doak Barnett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pp. 3-77.
- Hofheinz, Roy, Jr.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Isaacs, Harold R.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 Marks, Robert.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 1570-1930*.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 North, Robert C. *M. N. Roy's Mission to China: The Communist-Kuomintang Split of 192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 Schoppa, R. Keith. *Blood Road: 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Schwartz, Benjamin I.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 Smith, S. A. *A Road is Made: Communism in Shanghai, 1920-1927*. Richmond, Surrey: Curzon, 2000.
- van de Ven, Hans J.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Whiting, Allen S. *Soviet Policy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
- Wou, Odoric Y. K.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North China, 1920-1927: An Investigation into Organizational History

Yao-huang Che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Can we re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1920s through a more extensive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which is based on materials pertaining to the organization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ll try to analyze the organizat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membership. We not only want to re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before 1927 in north China, but also try to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in which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broke out.

Key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munist revolution, history of organization, north China, ecology of revolution